

交错继承的学术传统： 以抗战期间的一些边疆研究为例

田 耕

内容提要 本文从社会学家吴文藻所作的《边政学发凡》入手,讨论抗战时期的社会学家如何以本不在边疆的研究传统,来充实对边疆的调查和研究。这种实现是双向的,学者们的边疆研究是充实边政之学的前提,但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自身所秉持的研究传统是如何发展的。本文尤其关注的抗战前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传统体现了这种交错继承的连续。秉承这一传统的学人在边疆研究中如何创造性地转化概念和方法,构成了富有意义的学术史对象。

关键词 边政 社区研究 社会生态 边界

早在1926年,还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吴文藻就在《民族与国家》一文中回应了当时最为迫切的民族国家的建国运动问题。他追溯了民族作为自然力与国家作为政治力在法德现代传统中的表达。一战带来的民族主义运动,被吴文藻视为从勒南(Ernest Renan)直到威尔逊的“民族建国”思想的结果。^①吴文藻在《民族与国家》中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偶发而非一般情况。“吾且主张无数民族自由联合而结成一统之民族国家,以其可为实现国际主义最稳健之途径。”^②也就是说,如果多民族能够形成更有密度和强度的共同生活,就能整合成为一个国家民族,它比起单一民族国家更趋向于和平稳定,能够更稳健地实现国际主义。^③

26岁的吴文藻对民族与国家的思考多是概念考辨,但思考的起点无疑是一战后达到高峰的国族问题。吴文藻既肯定民族国家的大趋势,也对一民族一国家的民族自决运动有所保留,提出

了多民族国家作为创造稳定国际关系的基础理念。这样的思路也延承在《边政学发凡》对文化边疆的界定中。融合了不同文化特征的大小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它们能够联合结成一统之多民族国家,如果它们文明生活的密度及合作精神的强度并不弱于单一民族国家,那么它们团体生活之丰富浓郁足以能够让它们整合而成国家民族。^④无论政治边疆还是地理边疆的界定都忽视了边疆在文化上的差异,也忽略了依靠柔性的文化力量来统合边疆的潜力与可能。如果纯以民族国家和主权观念来建立政治认同,以政治和地理边界来理解边疆,那么众多包括中国在内的古老国家跨文明的特征将与其建设多民族一体的迫切问题相脱节。

同时,吴文藻也高度肯定传统中国的王道文化强调文教与涵化,而不是政治扩张力。^⑤吴文藻所谓的“王道精神”与他此后评介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表格》中所谓的“中华文明”有相当一致的

地方。^⑥但更有深意的是,《边政学发凡》希望将“王道精神”发展成为新的边政学知识学说,以充实到抗战后的边疆和民族关系当中。在吴文藻看来,截至20世纪中叶,“英美的委任统治观念,以及苏联的少数民族政策”皆为促进边疆文化理解的知识系统。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英美的委任统治观念,它不仅在意形态上引领当时国际主义的潮流,标志着殖民帝国主义在面临民族国家运动的妥协和转型,而且也与当时人类学的发展密切贴合,意味着殖民帝国以“科学”而不再是“经验”的知识形态来强化治理的基础和依据,这是值得注意的新趋势。吴文藻很留心19世纪末之后人类学和殖民行政结合产生的巨大变化,他将这个优势不止一次地与社区研究联系在一起,其实道出了同时代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的共同感受。^⑦在某种程度上,抗战的岁月成为激励中国民族学的田野工作超出蔡元培当年“俗民学”的根本动力之一。

抗战爆发后,南下的吴文藻在云南大学开辟了社会学的新阵地,也在西南后方启动了社区研究的新计划。吴文藻于1940年底离开云南,次年2月在重庆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任参事。发表在《边政公论》1942年第1卷第5、6期合刊的《边政学发凡》将边疆民族问题置于国际形势的发展轨迹之中,阐述了一个与此前的边疆史地研究不同的看待边疆的角度。^⑧那么,和吴文藻同时代的学者投身边疆研究的学术基础大不相同,用什么学问来充实边政就是学术史上很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将聚焦于和吴文藻一样出身于社会学的学者,讨论和比较这些学者所提供的充实边政之学问的可能。其中,吴泽霖在抗战前就很注意种族和族群问题,但没有社区研究的偏好,而李安宅、田汝康、蒋旨昂和林耀华等出自燕京学派社会学的学人,尽管求学的情境并不相同,但都受到了社区研究思路的影响。

1937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下,平教会和山东省政府支持的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集合了5所大学,制定了三年计划,将乡村建设和县政改革的目标统合成了农业、经济、工程、教育、卫生、民政、社会、行政等8项教育目标。这是吸取

了定县和邹平两大华北模范县的建设经验而提出的一个新计划。毕业于燕京大学,曾主持清河实验区的张鸿钧在协进会下的乡村建设研究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将山东汶上的县政改造办法延续了下来。不到一年,研究院从华北迁到了贵州,和从上海南迁到贵阳的大夏大学不期而遇了。

1938年的春天,身为大夏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吴泽霖创办了社会经济调查室(一年后更名为社会研究部)。在这所他已执教了12年的大学,经费紧张的社会经济调查室充满了活力,以贵州苗夷为主题,进行了一系列成功的调查。^⑨在1938年,吴泽霖接受了一项将风俗调查和新写地方志结合起来的任务。当教育部委托吴泽霖和王成祖找一处地方进行试点调查,检验一下刚刚编定的乡土志教材纲目时,吴泽霖选择了离大夏大学不远的定番县,而这个县刚刚被张鸿钧主持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定为实验县。

吴泽霖与大夏大学社会学系的陈国钧和张少微合写了报告。^⑩这份报告遵循了20世纪30年代教育部颁行的《乡土教材编目草案》的体例,分为13章,75小节以及2个附录(分别载于第9章“政治”和第10章“教育”之后)。除了最后的3章(11—13章)以及第1章的地理沿革和历代县志中专门记载的户数,这一乡土教材的绝大部分内容都仰赖于调查工作。^⑪

报告的第11章“社会”是定番县社会习俗的主要载体,该章又分为“宗教”和“生活状况”(即世俗生活)两端,后者占据大半的篇幅。在世俗的生活状况中,族群之分别显系作者关注的焦点,正如“社会”这一章开头所言,汉、夷、苗构成了定番县族群的主要类别。^⑫“生活状况”一节又细分为6目:饮食、服饰、住屋、燃料及杂用、婚事、丧事。在“燃料及杂用”部分,吴泽霖等进行了当时典型的生活费调查,在定番县的摆金(场)、马鞍山、么雪三个地方调查了共330家的生活费用,对三个地方的燃料费用和其他支出项进行了详细的陈述。熟悉这一研究方法的吴泽霖将这330家的支出结构,特别是饮食支出所占的比例与几个著名调查所公布的同一指标进行了对比。^⑬

吴泽霖等对定番县为汉、苗和夷杂居,而汉人又多赣川湘鄂等地移民的现实印象深刻。尽管报告第2章“人口”中专门记载了族群分布,但定番

县社会状况的族际差别其实贯穿全书,成为三位社会学家写作乡土志的主线之一。在“生活状况”中,除了丁目“燃料及杂用”是收入阶层之分外,其余5目都围绕着族群差别来展开,婚丧之事尤其体现了定番县的族群差别。“婚事”一目,下分为“汉人婚事”“苗人婚事”“夷人婚事”三部分,每一部分都包含了婚龄(人口),婚书(文书)以及婚礼仪式(行为和时序)三个要素,以社会学民族志的方式写作了乡土志的内容。同样,在己目“丧事”当中,报告也分为“汉人丧事”“苗人丧事”“夷人丧事”三个部分分别叙述。

就“生活状况”中的调查项来看,定番县乡土志材料对习俗的概念体认并没有超出20世纪30年代的风俗调查。吴泽霖等人除了动用传统方志不可得的人口调查资料,也放入了对各种民俗材料的观察。三人在记录定番县的丧事仪程的时候,特别记录了本地的“孝歌”。^⑭狭义的习俗为“社会”一章的第7目,吴泽霖等将之分为4条。其中的祭祀,除了祖先祭拜,也包含了节令性的祭祀。^⑮而在“禁忌”一条下,吴泽霖等专门收集了定番县的阴阳书。^⑯换句话说,这本乡土志教材报告构成了一个大的社会学田野报告,其对习俗的田野观察建立在三个支点上:人口描述、物质(器物、歌谣、文书等)呈现以及仪式-行动观察。习俗是通过三个社会学的窗口而进入乡土志之体的。

社会科学的手段给书写乡土志带来了微观田野工作上的巨大变化。与此同时,有没有这个乡土志的体例作为导引,社会学对地方社会的观察就会大不相同。就在吴泽霖等人所在的大夏大学迁往贵州的同年,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也把定番县作为了实验县,并在此成立了乡政学院。协进会的负责人之一,担任乡政学院副院长的社会行政学者张鸿钧还兼任了定番县的县长。乡政学院按照六个专题成立了工作组在实验县进行工作,而对实验区的社会调查则是乡政学院开展的工作之一。^⑰乡政学院协助定番县县政府的社会调查统计室制定了《定番县概况统计图表》和《调查须知》。^⑱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的统计图表丝毫没有涉及与习俗相关的内容,但《调查须知》详细交代了《定番县概况统计图表》背后的调查准备,堪称相当完备的社会调查手册。与吴泽霖主持撰

写的调查报告相比,《定番县概况统计图表》完全不在乡土志的任何框架下,它以县保甲的行政区划为单位,建立了对定番县的统计描述。对比这两份定番县调查报告的差异,可以看到,晚清以来形成的乡土志教材的体例本身,是促使社会科学的实地工作完成一个整体性的地方社会描述的重要刺激。

二

1935年,吴文藻的学生李安宅从加州到了纽黑文,转入耶鲁大学访问。1935年和1936年之交,李安宅曾积极地向洛克菲勒基金会争取将两年的访学计划延长至三年,使他可以在第三年前往英国和法国,了解一战后的欧洲如何将人类学应用于社会组织。这时的李安宅,将训练行政人才和训练研究人员看成人学在中国发展的两翼,如上文所说,这在20世纪40年代抗战中后期的边政学中成为明确的主张。^⑲1935年底,李安宅将乡村重建(rural reconstruction)视为中国的民族重生(national rebirth),它不同于此前广为人知的乡村建设运动,而需要将社会人类学培育出的“文化适应”(cultural adaptation)作为手段。^⑳

除了求助于司徒雷登,李安宅也请任教于牛津大学的汉学家修中诚(E. R. Hughs)争取额外的访英经费。尽管二人都努力帮忙,李安宅还是因为缺乏资金支持而放弃了英国之行。^㉑不过,这并没有影响李安宅在耶鲁的时光。即使萨丕尔(Edward Sapir)在1930年从芝大转到了耶鲁,主持刚刚成立的人类学系,耶鲁的人类学在建制上仍远不如加州完整。但比起加州大学,李安宅更加喜欢耶鲁,原因之一是他在这里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同行,准备用社区研究的方式推进人类学建设。^㉒

李安宅在耶鲁访学时,正是人类学最积极地投入到社区研究的时代。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华纳(Lloyd Warner)以社区的分层和流动为入手点的民族志重新点燃了人类学家对社区研究的兴趣。李安宅到达耶鲁的时候,华纳刚刚完成了在波士顿近郊的“洋基城”调查工作而转投芝大。在成立于1929年的人类关系研究所(Institute of Human Relation),华纳还没有正式出版的社区调查已经激发了李安宅对美国南方的研究兴趣。在

李安宅访学期间,该所的核心学者,心理学家多纳德(John Dollard)在南方腹地中的印第安诺拉进行了调查,并撰写了《南方小镇的种姓和阶级》(*Caste and Class in a Southern Town*)一书。^{②③}

在忧心和兴奋中,李安宅试图在耶鲁总结自己前几年的研究所得,在人类关系研究所,他遇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同样在南方腹地完成了关于族群和阶级关系调查的博德梅克(Hortense Powdermaker),李安宅视她为自己的同道。^{②④}博德梅克比多纳德更早完成了基于印第安诺拉的田野工作。不过,李安宅与博德梅克的共同兴趣不是马氏的学说,而是用社区研究的方法研究自己身处的社会。对博德梅克来说,它是美国南方腹地(Deep South)中的种族社区关系;对李安宅来说,则是在乡村建设运动中重新成长的中国农村。社会人类学只有在一种再生的热潮,而不是其他的情景里面才能发挥一种新科学的作用。李安宅所表达的这种热情和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的笔触非常相似。只要读读博德梅克的南方民族志的序言,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李安宅对这个研究充满了热情:“文化人类学不应该只是通过研究初民社会,不应该只是以比较和历史的手法,将产自初民社会田野的技艺间接性地用于自己的社会。相反,人类学家可以更直接地参与到本土社会的改造。因此,当前美国社会的田野点可以成为一个实验室,来检验习自域外文明的方法和观点”。^{②⑤}

博德梅克要比给《江村经济》作序的导师说得更直接,人类学家不是要超出初民社会而重返文明,研究自己的社会,而是要看到文明社会中别人看不到的问题。马林诺夫斯基礼貌地认为,费孝通和他的同事做了自己知而难行的事情,可是在博德梅克和李安宅这里,人类学家是冲着文明的不满,而不是文明本身而去的。身在美国的李安宅错过了1935年秋天拉德克里夫-布朗在燕京大学的一系列讲座,不过他多半难以同意后者在《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中对人类学家参与社区研究的理解。^{②⑥}对李安宅来说,人类学家回到自己社会的研究,不是为了建立比较社会学的基础,而是为了促发变革。

在社会关系研究所转换了眼光看待乡村建设的李安宅还遇到了萨丕尔在芝加哥大学指导的学生——奥斯古德(Cornelius Osgood)。年龄相仿的

两人对社区研究同样谈得很投机,专业是研究北阿萨帕斯坎区(Northern Athapaskan region,位于阿拉斯加)印第安人的奥斯古德只是在1935年去过一次中国,具备一点汉语官话的基础。但他和李安宅商定了一个比较社区研究的计划:李安宅写他的家乡河北迁安县的村庄,奥斯古德负责美国佛芒特州南部的一个社区。比起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和雷德菲尔德更为系统的比较社区研究计划,这个方案更加实际,也充满了年轻人的朝气。

1938年,李安宅和奥斯古德真的相聚在了昆明,在耶鲁校园中聊出来的研究计划最终完成了中国部分,但执笔人换成了奥斯古德。这个中国的村庄不在李安宅的家乡,也不是他学术生涯的任何一个重要的田野点,而是昆明西边的高峣村。^{②⑦}李安宅和于式玉在高峣待了两周半的时间,参加了一半的调查,而奥斯古德呆了五周的时间,和其他调查人员一起完成了这次田野工作。^{②⑧}本以为还有机会再行补访的奥斯古德此后再也没有去过昆明,也没有再踏足中国大陆。而李安宅在1947年再次前往美国教书,并在1948年抵达英国,完成了他在12年前想开展却没有实现的访问。两人在1938年之后没有再见面,那个中美社区比较的研究最终没有机会续写。从完成田野工作到出版各自的著作,两个人在中国边疆的民族志上都经历了漫长的等待,这或许是他们在昆明一别后的人生轨迹中最相似的地方。^{②⑨}

李安宅离开高峣之后,从昆明北上成都,接着踏上了去兰州的路,此行是他后半生学术工作的开始。1938年,李安宅和同样出身燕京大学的梅贻宝前往甘肃,李安宅在甘肃科学教育馆担任社会科学组组长,同时开始了他以拉卜楞为中心的三位一体的工作:宗教史、民族志和社会工作。这个研究的直接刺激来自1937年陶孟和的邀请,李安宅受邀第一次去了甘肃科学教育馆。在动身去甘肃之前,李安宅结集出版了《社会学论集:一种人生观》,全书分三编,共收集了40篇文章,可以算得上是从燕京到甘肃之间的转折记录。其中的第六章“无所适从”,领有五篇附录,全为讨论社会工作的文字,后收入了194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边疆社会工作》中。^{③⑩}

从1938年到1940年,在甘肃西南的田野工作不仅开辟了藏地民族学的新路,也酝酿了李安

宅对边政概念的新想法。关于拉卜楞的调查报告可以说是第二代燕京社会学人在抗战期间完成的最出色的民族志之一。《藏族宗教史之实地考察》的标题完整地展现了他在这工作三年的重心:藏地、拉卜楞和实地研究。李安宅在甘肃西南的田野工作凝集在一点,就是如何认识拉卜楞。这本报告的前三编(1—8章)对格鲁派佛教之前的信仰和教派一一论述,第九章才开始进入对拉卜楞的实地考察,李安宅开宗明义地指出,“对拉卜楞,可以用不同的观点来考虑:作为寺院,作为学校,作为居住区,或作为一个县”。^⑩换言之,拉卜楞是不同的地方性的集合,以社区志反观的宗教史,也应该体现这种集合。

李安宅对宗教的研究以史“地”为经纬,保留了燕京学派此前的社区志学风。在某种程度上,也给20世纪40年代云集成都华西坝的边疆研究带来了新的想象力。与此同时,同样源出燕京社会学,同样特别关注宗教问题的《芒市边民的摆》相比,两种关于宗教的民族志就显得分外不同。“摆”在田汝康的笔下是一个社会化的核心,他具备明确的经济生活和“社龄”上的功能,因此, he 可以把摆夷的人生安置在以“做摆”为节点的生命周期里面。“摆”无论是作为集体生活还是作为信仰的存在都超出身份的差异,“永不会为相关价值的争论”所惑,按照“摆”来安排的人的分工,对每个人都是一种满足。^⑪田汝康的调查本意是写一本关于“边地经济”的书,转到“摆”实在是一个意外。^⑫他保留在报告第6章中的经济论述,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财富消耗在摆夷社会中具有的抹平阶级差异的作用。

赴英国留学的田汝康此后用这个田野材料撰写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博士论文,尽管他的田野细节和写作方式发生了改变,但基本的笔调没有变化。“摆”随着他清晰老练的叙事而变成了不断和涂尔干以及弗洛伊德对话的理论话语。相比起在理论上讨论宗教和巫术的功能,做摆人的社区边界和生命感是次要的,一种类似方志之眼的民族志鸟瞰更是没有必要。田汝康的社会学研究承接了费孝通当年写作花篮瑶的手法,他明快锐利的观察使得社区更加一目了然地成为“社会”。非常有意思的是,与同一时期林耀华和陶云逵写摆夷的文章相比,田汝康的报告毫无疑问

包含了更为明显的民族志观察细节,他的访谈对象的动作、神态和心绪扑面而来,而他在观察中难以抑制的情感波动从报告的第一页就流露无疑。不过,除了开头第一段,这份报告或许是三者之中最不打算将摆夷作为族群去写的文本。陶云逵的文章是严格的历史人类学作品,而林耀华则是将摆夷视为掸泰族系的代表,“摆”即便被视为“夸富”的一种,也被当然视为族群的习俗,而不是典型的宗教体验。^⑬费孝通在为田汝康写的序言中从头至尾都在围绕宗教和巫术讨论而不论芒市一字,这的确是点睛之笔。

1941年7月,因为不愿离开西北而屡拒邀请的李安宅在同学罗忠恕的邀请下到了成都,商谈在华西大学成立边疆研究所。9月,李安宅答应加入华西大学的社会学系。这一年的秋天,同样出身燕京大学的考古学家郑德坤也加入了华西大学,并出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一年之后,已经成立20年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改为华西边疆研究所,华西大学校长张凌高为所长,完成了拉卜楞田野工作的李安宅任副所长。从这一年开始,李安宅和郑德坤都积极参与了著名的《华西大学边疆研究学会杂志》(郑德坤从1942年起担任该刊的秘书)的相关工作。藏地的民族学是华西边疆研究所发展的重点,李安宅一方面和他招募到所的藏地研究专家继续开展田野研究,^⑭另一方面则开始整理他自1934年留美的学术心得。《边疆社会工作》一书,可以说是对他加入边疆和民族研究十年来的总结。

这本书实际上有两个核心议题:一是如何认识内地和边疆的关系,这个关系在李安宅看来是新的建国道路的基础;二是以什么样的学术方式来培育边疆工作。和吴文藻一样,李安宅理解边疆的入手点是扩展政治和地理意义上的边疆。在他看来,文化和地形这两种意义上的边疆,实则都是由生态所决定的。在《何谓边疆》这一章,李安宅以拉铁摩尔的边疆观念为前提,一方面认为合理的边疆观念融合了生态区分和政治区分,而这种边疆观念凝结在历史中,就是所谓的边疆和内地的双重循环。^⑮另一方面,他所谓的“社会工作”核心是如何超出拉铁摩尔的边疆观念,在工业没有充分发展的情况下,从经济的区域分工和精神的区域分工(公民建设)两方面,“利用原有的地

形而超乎原有的限制”。^⑳边疆社会工作的历史对应物是边疆的经略之法,李安宅援引王拱璧的总结,将边疆经略分为怀柔、羁縻、威胁等八种形态。^㉑李安宅的观点代表了燕京学派在战时看待边疆的一个重要的眼光,即对成就新的边疆和内地关系来说,“社会”的构造是核心。^㉒

李安宅在《边民社区实地研究纲要》这篇文章中精彩地展示了他所谓的边疆社会工作如何取法人类学的概念和手段。对同时代的社会研究者来说,在进行边疆调查的时候撰写调查方法的纲要或反思并不罕见,但李安宅的这篇文章串联起了他在燕京大学和耶鲁访学时期的一些关键想法,也并非专为研究边疆而说。文中的“基本对象的各方面”一节,讲的是边民社区的调查纲要应该设置什么内容,可以视为李安宅心中的调查表格。李安宅以“适应”的说法统合了对调查内容的设置。人适应于自然者,是为“厚生”,是养其

类而至繁衍的基础。人适应于同类者,是为群居之道,李安宅将之层层递进地分为民风(“群众的习惯”),民仪(“民风中视为关乎群众的福利而应加以舆论上的拥护者”)和制度(“民仪中加以规章之制定或组织之维持者”)。改造少数人的旧传统,被李安宅称为“革命”,是群居之道的动力学。人对自己身心的适应,是为人格,其最后的圆满,李安宅以“存,吾顺事;殁,吾宁也”来概括之。^㉓最后,人对超自然(不可知)的适应,则是宗教。上述四个方面的适应,并不局限在边疆的研究,而民风、民仪和制度三者的递进关系,源自孙末楠(William G. Sumner)的名著《民仪》(*Folkways*),虽然李安宅对三者的静态区分照搬了孙末楠,但对其动态的关系,则较之孙末楠有极大的缩减。不过,无论是静态的概念划分,还是其变化的动力,都浸润在战前燕京学派的学风当中。^㉔

表1 “边民社区”研究的诸方面

章	节	条	目
一、对于自然界的适应	生活基础	土壤	
		气候	
		水利	
		动植等质量与分布	
		人口与土地利用比例	
	生活条件	重要职业	
		舟车种类构造	
		渔猎等武器	
		饮食方法与器具	
		居所家具与布置	
		村落聚居方式的布置与防御	
	使生活丰富的技艺	耕种所利用的动植物及工具种类	
		纺织	
		染色	
		炮制皮革	
		玻璃	
		瓷器	
		烟及烟管	
		陶器	
		盐、酒制造及保存	
		医药	
		雕刻	
	冶金		
宝石			

续表

二、对于同类的适应	团体分成	社区人口		
		组成分子(性别比、年龄、种族)		
		社区的种类(同姓村、复姓村、渔猎或矿工区)		
	生命阶段	降生礼节		
		生活学徒期(学校及其他)教育方式		
		成年礼仪式(冠礼、笄礼、打脱门牙、生殖器手术、发肤衣饰分别)		
		婚娶手续及仪式		
		胎教及孕期		
		生产期禁忌		
		人死后入殓方式		
		葬的措施		
	吊的方法及纪念方式与时期			
	团体结合方式	两性关系	如何求爱	
			单婚或是复婚	
			姓氏与承继是男系或女系	
			掌管家政是男权还是女权	
			居住地是男方还是女方	
			离婚手续与条件	
			子女如何分配	
		贞操观念婚前婚后是否有别		
		家庭组织	共爨是什么人	
			生物、经济(包括承继权)、宗教、生理功能哪项被承认并如何布置	
			亲子兄弟及旁亲属有何关系	
		宗族组织	族内婚还是族外婚	
			乱伦禁忌影响哪种人	
			族长权力怎样	
			谱系如何编制保存	
			祠堂存在、维持、功能有怎样情形	
			外人是否可以承宗继祖	
			族与族关系如何	
		如何维持		
		公民原则和组织	公民观念或超过血缘的地缘组织是否存在	
			政治升替有怎样机构	
			递传权柄的手续如何	
			被统治的义务权利怎样	
		国际关系	宗亲原则与公民原则过渡情形	
		法律、战争和其他团体生活	国际关系	
			以上几项的最高理想	
			怎样算不道德	
			是否有法律系统	
罪犯(违背良心或神意)与刑犯(违法)有无分别				
战争构成条件、解和手续、战士训练、理想怎样				
武器种类及使用,交易的种类及媒介(货币),娱乐竞赛等布置、时期种类,以及其他团体生活各方面,以上没提到有什么				

续表

三、对于自己生理心理的适应	身体外表	文身(是否有男女、阶级、种族区别)	
		补牙、耳环、鼻唇等饰品	
		头发的装束	
		生殖器佩物	
		男女服装	
	身体本身	体格长短肥瘦	
		毛发伸屈	
		眼的平斜浮陷	
		唇的厚薄翻正	
		颌的宽狭陷突	
	心理	头的长宽高低	
		脾气是沉郁还是富于表情	
		自我是强还是弱	
智力是平庸还是上智或下愚			
四、对于超自然界的适应	信仰本身	生活力是强壮还是应付不暇	
		信仰对象	神之一多、等级、性质及其他偶像符篆、信条之类
		信仰关系	如信徒对于崇拜对象的身份(父子关系、还是什么)
	维持信仰的机关	信仰状态	信徒的节仪、禁忌、心理准备(祈祷诵经)
		寺庙教堂(组织、经济来源、徒众的收录、训练、戒命、递传)	
	信徒组织	如僧伽、教会、因性质而有的法会与因集结而有的集会,对非信徒的宣传与组织	
宗教事业	各种社会服务等工作		
五、适应的工具	手用的各类器具	事物名单	
	脑用的语言文字	语音、文法、文体、字形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参见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95—99页。

三

随着林耀华重回燕京大学,李安宅结束了兼顾燕京和华西的状态,将全部的工作重心转到了华西协和大学社会学系和边疆研究所当中,和他一样从燕京大学转入战时华西坝的还有比林耀华小一岁的蒋旨昂。在1941年加入华西协和大学社会学系之后,蒋旨昂的第一个研究项目是“战时社区”,这是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的继续。

1943年初,蒋旨昂和于式玉从成都出发,赴川西第十六区专署所在的“茂县至马塘”之间的区域进行考察。在报道的开头,蒋旨昂像历数驿站一样,一点一点地表述了此行的考察区域,且以其中“沙濠至马塘”之间相距590里的黑水区域为重点考察对象。^④黑水之行的种种曲折和况味,在同行的于式玉笔下叙述得非常精彩,蒋旨昂的

报告则去除了所有行记的痕迹,但社区民族志的色彩没有丝毫减弱。蒋旨昂的报告放在“社区”这一目下的内容就是社会关系,准确地说是“黑水社区”中不同的人群之间如何看待彼此。这种关系的表面,是能否理解彼此说的语言。^⑤而其关系的更深层面,一是共时性的关系,即不同人群的敌友和亲疏关系。蒋旨昂承接上文,在报告中简要指出,语言相通和关系相好之间未必重合。^⑥二则是源流性的关系。蒋旨昂指出,黑水与来苏在衣饰上更加接近,“所受西藏影响,都较羌民所受更多,而且黑水人所不同于藏民的,却同于来苏人”。^⑦从共时和渊源两方面,蒋旨昂的社区分析首先落在对人群边界的观察上,这种边界观察不借助事件而展开,是一种变相的社会生态观察。这与林耀华在凉山夷家当中直面彝族内在的身份裂分(cleavages)和冲突有相当的不同,也和田汝

康以身份差等为背景将宗教的整合作用写在前台的手法有明显的区别。比较而言,嵌入在一个社区单位内的边界的写法,更接近李安宅在拉卜楞中看到的内部边界的问题,只是李安宅处理了拉卜楞所包含的政区边界和人群边界两个主题,并赋予两种边界凝练的历史维度。不过,从内在的边界出发理解社区,在临近和类似的生活环境中发现细微区分和紧张,可以说是关于边疆和族群的民族志研究中最经典的手法之一。^{④⑥}

社区内的边界和裂隙会产生跨越边界的种种行为,同时,被边界区分开的生态和人群也有相对独立的发展方式和传统,怎么平衡地描述这两个方面,对社区民族志是一个考验。^{④⑦}在这一点上,战前燕京学派的社区民族志尤其重视社区中的链接和融合机制,不仅重视这些机制的时空分布,也擅长剖析其机理。^{④⑧}蒋旨昂的报告相当清晰地体现了社区研究的这一特点。黑水区域既为一个社区,其核心不在集市,而在所谓“衙门”(“黑水人在说汉语时称统治者的住所为衙门”)。^{④⑨}衙门最直接的“核心”作用是外地商人(较远的是甘肃回商,较近的是松潘商人)在此进行贸易的中介和仲裁作用。但除了中间人的角色,衙门对黑水社区的凝聚作用还表现在作为头人家产的管理方,而头人的管家们也会以衙门为中心建立自己的小家(寨子)。衙门是头人的家门,因此衙门的兴盛与头人家族的人丁兴旺与否有关,麻窝超过另外两处衙门(龙场和杉板沟),成为“衙门中的衙门”,在蒋旨昂眼中便是因为“地点适中,人口密集,头人能干”。^{⑤⑩}衙门作为社区的第三重含义,是它内设经堂,外与喇嘛寺比邻而居的关系,这是黑水社区中政教关系的特点。^{⑤⑪}蒋旨昂以简明的描述勾勒了衙门在黑水中的三重功能。

尽管蒋旨昂对衙门的功能有清晰的体认,他主要的兴趣仍是活动在衙门这个社会空间的头人和其他往来的人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里面包含了时空中的互动和安排,他和于式玉都对衙门作为起居空间的部分非常感兴趣。由此申发出去,蒋旨昂在报告的第3小节颇为细致地描述了麻窝头人苏永和的亲属网络(他所谓的血缘),即一种有利于头人统治的庇护关系。他试图理解头人政治是怎么改变了这一区域的政治向心力的。这个兴趣要比同行的于式玉更为强烈,比较两人黑水

之行的考察文字,于式玉的《麻窝衙门》的内容与蒋旨昂的报告内容接近,衙门当中的起居安排、社会角色和互动,以及苏永和的亲属关系,同样是于式玉报告的重点。但于式玉花了更多的笔力作了一份黑水社区的风土志,这便是篇幅远超《麻窝衙门》的《黑水民风》一文。^{⑤⑫}习俗的考察融合了宗教、仪式和民情,很自然地将“麻窝”和“黑水社区”这两个地点的特征鲜活地呈现了出来。

蒋旨昂的报告几乎不从民风上解释任何问题,唯一的一处是报告的开头,他指出麻窝是“社区对外关系的分水岭”,这是因为,“麻窝以下的人,与内地人比较接近,他们可以出茂县,经过灌县或绵竹,到成都及其附近各县打井、淘井、筑堤、修堰。麻窝以上的人,则多去草地或更远至甘肃,作贩卖牲口之类的生意。甘肃回商也远来此寨贸易,却不再下去与内地人接近”。^{⑤⑬}这是对麻窝的生态位置的一个最直白的描述,蒋旨昂完全没有展开,但对生态位点的敏感却是社区研究的一个关键的素质。^{⑤⑭}在和他年岁相仿,也同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对川康地区进行研究的林耀华那里,这一点体现得很明显。

李安宅和于式玉完成拉卜楞的田野的时候,比他小10岁的林耀华刚刚完成了博士论文。在美国的最后一年,林耀华恰到好处地总结了自己在福建进行的第一个田野。《金翼》独具风格的人生史文字将他在老家义序的回忆和调查变成了一部特别的社会学民族志。但这份直到今天仍然深有启发的人生史笔法,还不是燕京社会学影响他最深的地方。社区的观念从东南汉地的宗族绵延到了西南的边陲。以环境、人和文化来定义社区的做法,和战前吴文藻的思路完全一致。^{⑤⑮}燕京学派的社区志的影响继续鲜活地体现在成为燕大教师的林耀华身上。

社区的前提是地理区位,而社区的历史就是环境、人和文化三者交织的历史。生态和人群聚落是林耀华划分复杂的西南边疆的基本着眼点,而西南诸省之间的交界地带,更是研究社区意义上的边疆社会的关键。林耀华1945年在川康交界的嘉戎地区的民族志很强烈地渗透了这个思路。《川康嘉戎的家族与婚姻》的开头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川康北部交界区域,以地势论,乃系康藏

高原的极东地带。这地带北有岷山南有邛崃山脉,彼此纵横交错,低地则河流交织,间成平坝河谷……从文化上而论,东部中原文化的汉族,早已占据盆地,立下根基。西部藏族文化亦渐于拉萨中心,向四邻扩展。历代民族斗争,人口迁徙,弱小的部落遂被驱至川康北界……这些弱小的部落,大别有羌民、嘉戎、西番各族,迄今仍是相互杂处,彼此为邻,形成川康间的特殊边区……大约言之,在川康北境之内,羌民居于东,嘉戎居于西,西番居于北,三族形成地域上的三角关系。^{⑤①}

林耀华以滇东为 midpoint 区分的三个亚区,和他早近十年进入西南考察的陶云逵的想象相去不远。^{⑤②}总体上,林耀华的思路回应的问题是边疆研究如何独特地体现这三个因素独特的交互?但更重要的是,林耀华完全放弃了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民族学调查这一手段。他将地理、人和文化三者具体化到边疆民族调查的情境之中。其中的地理变为区域板块。以他博士期间研究的西南民族为例,林耀华指出,此地区边疆地理的核心动力一是汉民族南下,二是众所周知的三大西南民族分支:苗瑶族、泰掸族和藏缅族,在西南形成的亚区以及相互的杂处。^{⑤③}林耀华将人的要素变成了个体生理和语义学的结合,而在功能主义基础上形成的社区志的传统,则被他用来描述文化一说。他倡导的社会关系的平衡(equilibrium)和抗战前吴文藻开启的社区志的思路仍然非常接近。^{⑤④}这是社区论明确吸收了民族史演变后的新变化。

余 论

本文简要讨论了几位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学家在抗战期间进行的边疆研究,以此来回应吴文藻在《边政学发凡》中没有讨论的,以何种学问来充实边政之学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边政学或边疆研究如同时代的棱镜(prism),给学者们映照出战前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未曾显露的缺憾,自然也照见了一些想象不到的机缘。因此,学者们因为抗战引发的民族危机,从其他不直接相关的领域转到边疆研究时,不仅将固有的社会学应用于边疆时空和人群,而是延续了在更长时间内形成的学术潜流。本文涉及的以社会调查为新方志(吴泽霖)的做法;民风-民仪-制度的三分,以及本文

的核心,即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莫不如此。进入边疆研究对于上述学者以及抗战期间的许多学人,首先是生命和学问的巨大变化,但往往在此时刻,学术上的奇妙感通更加关键。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内在的两部分都在回应吴文藻,但他将繁复的调查表格予以简化的核心概念——“适应”,却取自战前的燕京学派。他对拉卜楞的多重地方性的描写,和蒋旨昂对黑水社区“内在边界”的写作方式,都显示了此前社区研究的时空敏感性,这种敏感性远超简单的社会生态位描写。无论抗战前的清河市镇,还是同一时期华西坝的“场”的研究,都体现了市镇社区的研究所包含的巨大生命力。这些难以预料却割舍不掉的连续性,值得我们将学术的人生史和研究的谱系学做进一步的结合,将生命史中的时空顺承和观念特有的时空错置(sequential order and anachronism)做进一步的结合。^{⑤⑤}

①②吴文藻:《民族与国家》,载《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08—410、419页。

③徐益棠在回顾20世纪30年代民族学的进展时,也指出了类似的矛盾,即学界所重视的民族学,其实是韦斯特马克等人的进化人类学,而边政关心的,是“土地”与“主权”两端,而对“边地民众之如何认识,如何开化,如何组织与训练”较少重视。参见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1942年第1卷5、6期合刊。

④参见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载《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77—578页。陶云逵进一步将拓殖对边疆的影响分为两部分:“一国国民移植他邦自成一社区”,取得殖民统治之权,则此殖民地为其母国政治边疆的一部分,例如说 settler sovereignty;而没有取得统治权,此海外居住地被视为母国的社会边疆。参见陶云逵《边政人员专门训练之必需》,《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3、4期合刊。

⑤“王道”转借于孙中山,指的是造成民族的“自然力”,与造就“国家”的武力相对,孙中山认为自然力造成民族者有五端: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参见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载《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76页。

⑥“中华民族五千年所缔造的文明”是一个独立完整的有机体,它“逐渐的生长,逐渐的把领土扩大,使境内境外许多文化比较落后的初民异族,逐一同化,最后使他们纳入这广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合体中……所以不但邻邦被我潜移默化,即使征服我们的异族,亦常常被同化于中国的社会秩序及道德规范之中”。吴文藻:《论文化表格》,载《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94页。

- ⑦吴文藻:《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载《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31—233页。吴文藻非常清楚,功能主义人类学改变了人类学与殖民行政的关系,而且也是其他欧洲国家在当时没有的。参见吴文藻《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与其在学术上的贡献》,载《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50页。关于此一时期其他中国人类学家对委任统治的态度,参见刘咸《国防建设与边疆民族》,《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9号;黄文山《综论殖民地制度及其战后废止的方案》,《民族学研究集刊》1946年第5期;马长寿《人类学在我国边政上的应用》,载周伟洲主编《马长寿民族学论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7页。
- ⑧地理观念上的边疆。以胡焕庸《国防地理与国防诸书》为例,边疆指地理上以传统文教和政治治理的中心与边缘来界定的边疆。我们通常说的塞外、域外、关外,与内地即中原、腹地、关内相对应,即是地理边疆的含义。吴文藻同时指出,边疆还可以是政治上的边疆,也就是疆域上的边疆,从主权和领地的边界来界定的边疆。比如中国三面陆界,一面海界,这在高长柱领土主权区别的国防线中已经得到阐发,参见高长柱《边疆问题论文集》,正中书局,1941年。
- ⑨哈正利编:《吴泽霖年谱》,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23页。
- ⑩1937年1月,吴泽霖和张少微在江苏开启了大夏大学乡镇社会实况调查的项目,他们和上海市地方协会合作,调查对象是苏州河上的船户,参见《大夏周报》1937年第13卷。在这一年召开的中国社会学年会上,吴泽霖和张少微当选中国社会学会会刊《社会学刊》的编委。
- ⑪调查报告第2章中的人口数据,主要依靠1936年的人口调查所得。
- ⑫“定番的民情淳朴,人民勤劳耐劳自耕自织,尚能自给自足。只以交通梗阻,一般文化咸落人后,而全县人口又汉与苗夷参半,各族间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大相悬殊,致使各成一个社会,种族间的冲突也就时常发生,急待调整”。参见吴泽霖、张少微《定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载贵州省文史馆编《民国贵州文献大系》第2辑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01页。
- ⑬与之进行比较的其他生活费调查包括陶孟和主持的北平48个工人家庭的生活费调查(1925—1926),这一数字原貌可参见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32—33页;美国学者卜凯主持的中国6省13区(1922—1925,共2370家)的生活费调查;定县调查中34个家庭的生活费分析(1928—1929);以及江苏省125家的生活费调查(由吴泽霖所在的大夏大学于1935年进行)。除此之外,就是没有提供数据来源的芝加哥的生活费调查。吴泽霖等将调查对象分为“贫困者”“小康者”“安乐者”三类。以上参见吴泽霖、张少微《定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载贵州省文史馆编《民国贵州文献大系》第2辑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10页。
- ⑭⑮⑯吴泽霖、张少微:《定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载贵州省文史馆编《民国贵州文献大系》第2辑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18—230、324、325—326页。
- ⑰六个专题工作组分别为教育组、公共卫生组、农业组、工程组、经济组和行政组。其中,行政组对全县联保主任、保甲长进行培训,而且协助定番县政府成立“妇女工作指导室”,教授妇女识字、常识等,另外还整理定番县档案,做人口分析;经济组主要是开展合作事业,制定合作发展计划;公共卫生组与其他单位成立定番县卫生院,定期检查人员身体;农业组接管农业职业学校,建立农场;教育组则是开展培训当地中小学教师工作。
- ⑱报告为统计图表汇编,包括定番县地图、人口、土地、农产品、房屋、牲畜、民族、财税、气候、教育、河流道路,共计23个表格,收入国家图书馆选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汇编》第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305—328、535—568页。
- ⑲李安宅致司徒雷登信函,1935年11月22日,耶鲁大学藏李安宅档案,档案号340-5195-1057/1058。李安宅致 Selskar M. Gunn(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项目的首任主任)信函,1935年11月26日,档案号340-5195-1061。特别感谢吴景键博士慷慨分享这部分档案。
- ⑳李安宅致 Selskar M. Gunn 信函,1935年11月26日,耶鲁大学藏李安宅档案,档案号340-5195-1060/1061。
- ㉑司徒雷登致李安宅信,1935年11月25日,耶鲁大学藏李安宅档案,档案号340-5195-1059;修中诚致李安宅信函,1936年1月30日,耶鲁大学藏李安宅档案,档案号340-5195-1078。
- ㉒李安宅致司徒雷登信函,1935年12月17日,耶鲁大学藏李安宅档案,档案号340-5195-1067。
- ㉓参见 Mark A. May, *Toward a Science of Human Behavior: A Survey of the Work of the Institute of Human Relations through Two Decades, 1929 - 1949*,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p. 67。
- ㉔“就理论取向上来说,我觉得人类关系研究所的博德梅克博士的眼光跟我几乎一致,而从我抵达耶鲁以来,我就一直在琢磨着这一点,并把它作为我此前经验的总结。”李安宅致 Stacy May 信函,1935年12月18日,耶鲁大学藏李安宅档案,档案号340-5195-1068。
- ㉕ Hortense Powdermaker, *After Freedom*, New York: Atheneum, 1968, p. 13。
- ㉖参见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02—310页。
- ㉗奥斯古德:《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农村生活:对云南高峒的社区研究》,何国强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38—339页。奥斯古德把这本书题献给了李安宅。

- ⑳ 奥古斯德书的序言作者霍金斯和中译者何国强均认为整个调查持续了五周，而李安宅夫妇参与了两周半的时间。参见奥古斯德《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农村生活：对云南高峒的社区研究》，何国强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7页。
- ㉑ 在开始拉卜楞的田野之后，李安宅发表的第一篇相关文字是《拉卜楞大经堂—闻思堂的学制》，载《新西北月刊》第2卷第1期。此后到他1947年访美之间，李安宅用英文和中文发表了若干依据拉卜楞田野工作的文章，但没有集成成书。他访美期间依据此前的文章完成了英文书稿，但因为中美断交，他交给耶鲁大学出版社的英文书稿最终下落不明。20世纪80年代，李安宅将当年英文稿的副本（无插图）译成中文，是为《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奥古斯德在1938年完成调查之后，到1961年才动笔将之写成书稿。
- ㉒ 事实上，从1936李安宅自美国返回燕大教书，到他前往甘肃期间，除了这本文集，还有他翻译的马林诺夫斯基和曼海姆的作品各一部，以及对葛兰言的名著《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的英文书评。
- ㉓ 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9—120页。
- ㉔ 田汝康：《滇缅边地摆夷的宗教仪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8—109页。
- ㉕ 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页。
- ㉖ 陶云逵：《车里摆夷之生命环》，载李文海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少数民族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03—269页；Y. Lin, “Social Life of the Aboriginal Groups in and around Yunnan”,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 XV, Series A(1944), pp. 52—53.
- ㉗ 陈波：《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巴蜀书社，2010年，第113—114页。
- ㉘ 所谓外边疆，是生态边界，而内边疆（李安宅称为“边缘”）则是介乎农耕平原和游牧草原之间的过渡地带。边缘，从西北延伸到西南，在拉铁摩尔笔下，这是草原和农耕两大生态体系的交界处，不仅决定了两个生态内部的历史循环，也成就了改变中国历史的征服王朝。参见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7—8页。
- ㉙⑳㉚⑳ 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0—11、23—24、95—99页。
- ㉛ 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27—29页。关于这一点，参见王利平《知识人、国族想象与学科构建：以近代社会学和民族学为例》，《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年第3期。
- ㉜ 例如黄迪的硕士论文对三者关系的检讨，参见黄迪《孙末楠的社会学》，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70—78、121—157页。黄迪对孙末楠笔下从民风到民族性的演变过程极感兴趣。

- 1934年，还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的瞿同祖在《社会研究》上发表了《俗、礼、法三者的关系》一文（《北平晨报》1934年4月25日，第1版）。瞿同祖将习惯视为个体趋利避害的本性中发现的较好的生存手段。而风俗则被瞿同祖比作群体的“习惯”。瞿同祖的文章在共时和历时的关系上扩充了作为群相的风俗。风俗在横向的关系上有“模仿”、从众和身份强制等机制的支持，而在纵向的关系上则是一种文化传承。瞿同祖的文章尝试综合中国传统中的礼制问题，但无论是文章的三分法还是模仿、从众和强制，都脱不开孙末楠的影子。
- ㉝⑉④⑤④⑤①⑤③ 蒋旨昂：《黑水社区政治》上，《边政公论》1943年第2卷第2期。
- ㉞ “黑水人自认除了同勃罗子沟的话相通，也懂几句九子屯的羌话，但不懂松冈（读为荣冈，普通写作松冈），马塘或杂谷脑的话，后三处所说的都是嘉戎话。实则黑水各寨也互有差别”。参见蒋旨昂《黑水社区政治》上，《边政公论》1943年第2卷第2期。
- ㉟ 参见巴特《族群与边界》的“导言”，李丽琴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7—11页。“同中求异”的做法，参见 John Cole and Eric Wolf, *The Hidden Frontier Frontier Ecology and Ethnicity in an Alpine Valle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 ㊱ 1940年，费孝通曾批评艾科瓦（Robert Ekvall）依据自己在1923—1935年间在甘藏边区的生活所写的族群关系研究，费孝通认为，只依据亲身经历并不是人类学田野，见《图书季刊》1940年新第2卷第1期。不过，艾科瓦的这本书读起来，恰恰不像一个长期生活在此地的人的见闻，而是非常齐整地将文化关系放在了不同人群的两两关系（dyadic relation）之下。文化关系就被简化成了四个人群（汉民、回民、游牧藏民和耕作藏民）的六组关系。艾科瓦将此研究提交给了芝加哥大学的“族群及文化接触”讨论班，而主持讨论班的社会学家对这一研究的主要质疑，也恰恰是人群的四分和两两关系的描述和比较，是不是足以描述边区和边界的文化构造。参见 Robert Ekvall, *Cultural Relations on the Kansu—Tibet Bor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9.
- ㊲ 参见傅春晖《基于集镇的乡村社会：杨懋春的农业社区研究》，《学海》2021年第2期；傅春晖《早期燕京社会学的人文区位学研究——以杨庆堃的〈邹平市集之研究〉为例》，《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5期；侯俊丹《市场、乡镇与区域：早期燕京学派的现代中国想象——反思清河调查与清河试验（1928—1937）》，《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3期。
- ㊳ 于式玉：《黑水民风》，《康导月刊》1945年第6卷第5—6期，载李安宅、于式玉《李安宅、于式玉藏学文论选》，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第526—565页。
- ㊴ 王明珂在川西羌族地区的田野工作，正好是从宏观生态界分的眼光出发，重新描述和解释微观的社会生态（例如蒋旨昂提到的寨和沟）分界，他的田野地点正好包括了蒋旨昂考察

的黑水社区,而王著提出的“一截骂一截”的心态,很好地阐发了蒋旨昂没能继续发现的“外在关系关键点”的丰富含义。参见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19—123页。

⑤林耀华:《边疆研究的途径》(1943),载凌纯声、林耀华等《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方法》,民族出版社,2004年。

⑥林耀华:《川康嘉戎的家族与婚姻》,《燕京社会科学》1948年第1期,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文史编辑室编《燕京大学学术期刊汇编·社会学卷》第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139—140页。《川康嘉戎的家族与婚姻》一文第1小节,“嘉戎社区与民族”的前5段,与林耀华的另一篇文章《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第1小节“川康北界的区域状况”一致,是对这一区域如何成为“羌、嘉戎和西番”聚落状态的历史和地

理述要。林耀华对川康北界从生态和族群边界上的区分法,在此后的历史人类学当中仍有回响,典型的做法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⑦田耕:《中国社会研究史中的西南边疆调查:1928—1947》,《学海》2019年第2期。

⑧⑨林耀华:《边疆研究的途径》,《边政公论》1943年第1、2期合刊。

作者简介:田耕,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北京,100871

[责任编辑:毕素华]

Entangled Scholarly Traditions: The Ca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Frontier Studies in China During the WWII

Tian Geng

Abstract: Looking into the intellectual textures of some well known Chinese frontier studies during the WWII, the paper examines how their authors succeeded to get their inspirations from the research traditions that originally had little to do with frontier. Travelling from non-frontier research to frontier studies, scholars created the intellectual continuities they never expected and the frontier studies were enriched by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s rising from other research areas. In particular, this paper shows how some scholars from the Yenching School of sociology creatively transferred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community study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frontier. The entangled traditions thus contribute to the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sociology.

Key words: frontier study; community study; social ecology; boundary